

編者按

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李丹慧的文章探討了毛澤東在1964至65年間的安全戰略思路及其轉變，認為在毛澤東的性格和思維定式中，蘇聯情結、革命衝動和憂患意識這三個支撐點的相互作用和變化導致他最終發動文化大革命，以解決他多年縈繞於心的中國政治走向和前途命運問題。

「政治與法律」欄目，董國強的文章敘述了發生於1967年的江蘇「一·二六奪權」事件，通過對這一奪權事件全過程的解剖，揭示「文革」的意識形態和具體做法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李巧寧的文章探討了1949年後在新區土改中發動的「鬥地主」運動，認為對地主的鬥爭打破了地主階層在經濟上的優勢和在當地農民中的威望，也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價值觀念。

「經濟、社會與傳媒」欄目，陳意新的文章考察了知青一代的命運，指出他們從下放到下崗的人生軌跡充滿了不幸，他們承擔了革命與改革的社會經濟成本，理應得到國家的補償。

「人文天地」欄目，張超的文章借著對電影《若望·保祿二世前傳》的評論，表達了對於自由、民主、專制的思考。

「書評」欄目，陳奉林的文章是對何芳川先生的《中外文明的交匯》一書的評論。